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 578 號

祇供參考
請勿發表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美國在日本的一番事業

〔美人 Houghman Warner 原著〕
譯自本年三月號幸福雜誌

佔領日本以一個驚人事件開其端，這事件留下一個那麼深刻的印象，它處處影響到佔領者的決策和被佔領者的反應。這事件使佔領日本不是外人對一群戰敗東方人的咆哮統治，而很可能是歷史上傳播文化最成功的一個例子。

這驚人事件就是當一架非武裝無護送的運輸機飛到厚木機場上空的時候，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那時日本雖然戰敗可是整個日本還是一個武裝軍營，有不下於二百五十萬受過訓練的軍隊和七千三百萬受過宣傳的人民。在運輸機裏麥克阿瑟將軍和他的僚屬靜靜地在推想日本人的接待，在地面上整個日本的人民也一樣靜靜地在推測運輸機降落了美國人。員被接到車子裡，在敵方警察護衛之下，車隊向橫濱進發。路上經過一個地區，那裏戰前日本的整潔已不再存在，能夠見到的只有轟炸的殘痕，穿過了整個民族苦痛疲乏的證據。小小的車隊靜靜地橫濱前進，又是平靜無事。

日本人的紀律沒有改變。本公在戰時，他們向來是命令歡迎美國人的時候，他們就歡迎，面對着少數征服者——就是他們以前宣傳中的所謂怪物，他們俯首敬禮。

俯首敬禮沒有攪亂了佔領的遠大目標，改變日本人的心理，使他們決不再企圖戰爭。但是俯首敬禮深深地影響到完成此項目標的方式，因為這表示出當地人的順從和紀律。這種性質麥克阿瑟早已知悉，所以他敢冒險降落厚木機場的危險。佔領可能以大不相同的方式進行，前往佔領的美軍可以使日本蒙受劇烈而紊亂的整肅，這時候日本人民也許起來反對他們。

JUN 14 1947

曾經漫順地服從過的天皇和貴族。然而，就由於使日本人民服從領導的紀律，美軍登陸沒有傷害過一條生命。於是從厚木降落一事以後，美國處理天皇從事緩進改革或急進清除的大問題，就變成是否要使日本有秩序還是紊亂的簡單問題了。

這決定是必然的，而以後的一切就根據這決定而來。在日本，命令含有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對勝己者的義務服從，自制和自讓，命令就是天皇的名字，是紀律的拱心石，命令即神道教天皇名字的支柱，命令表示日本政府的延續。日本政府的斷絕可能顛覆日本有紀律政治行動的垂範，那並不是說，天皇制度不能重定，神道教不能加以整肅，和日本政府不能改革。可是這話確實意味着日本人的心理基礎不能突然鬆解。

登陸的情形，日本人的驚奇不下於美國人對於美國人的談論改變了。日本人過去用專指卑下人的諷刺談論美國人，突然間改作用保留給優等人的字眼談論了。日本人從不問施與的原則，他們歡迎美國人，事實上有如歡迎他們的太上皇，命令叫他們歡迎——他們的歡迎出於激發，這激發和引他們去戰爭的激發沒有分別。正如戰爭在當初代表峻毅和平羈絆下光榮而被動的爆發，和平就成為過去幾年來戰爭恐怖和束縛之後光榮的爆發，雖然這爆發仍是出於被動。在等候佔領期間，伏着一個民族對一個新奇的無限愛好，這民族傳統上很少做新的事情，也伏着一個民族的野性熱心，這民族對稍有過度的行為就現怒容。

美軍既不播弄日本女子亦不播弄天皇，相反地，美軍表示出高度的寬大和對改進黨員不為過度的高度關切。日本人明白了這些以後立刻表示出赤誠的熱心，可是這熱心裡掺杂着幾分猜明的預謀。日本人渴望知道戰爭的事實，他們很快地知道他們的領袖們曾欺騙他們，而美國人已救了他們。麥克阿瑟將軍的聲望是那麽高，大部分日本人都對他崇敬許多。日本人把他看做是神，還有人稱他為神武天皇的再現身。佔領機關的各種縮寫成為有魔力的字母，一提起這些字母就足以引起一個行動，翻轉一個行動，或阻止一個行動。許多日本人自佔領當局為對抗他們自己政府的保護者，大批的訴苦信向各佔領機關裡送，各種報紙都勸戒政

府善待麥克阿瑟將軍。

三

有些財閥帶了計劃書到佔領機關裡來，請求停止他們自己的獨占事業。貴族院未經美國施以任何壓力，自動取消貴族的爵位。日本政府刷新人事，比美軍當局的要求還激烈。六百名下院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有四百二十五人。獨裁派有腦的內相自動開始剝奪權力。被認為對戰俘施過殘行動的戰犯感激美國軍事法庭審判的公正。國會議員第一次起草立法。以前沒有公民權的婦女有百分之六十六順從地參加第一次的普選投票。在日比谷市民會所仿設的一個市民大會堂廣播辯論會，只有三千座位，却經常吸引來六千申請人。一個女學生在上課時突然唱歌，被斥責時她說：「現在一切自由了。」

東京主要的熱鬧街道銀座許多小貨攤很快地就有吉普車玩具出售。渴望報紙雜誌和書本的情形遍於全國。他們渴望討論美國的書，選舉票的樣本關於地方政府的論文，科學教科書和公民學入門。一部日本人寫的麥克阿瑟將軍傳，成為非小說作品中最高銷的書。而一本美國人寫一個美國記者和一個日本女影星間艷事的庸俗作品，竟成為最高銷的小說。日本政府堅持要翻譯康涅狄克州政府概況 (An Outline of Government in Connecticut) 這部書。

這種熱心當然使日本陷於惶惑。日本缺乏正確的方向，或者說往往缺乏具體的目標。有改革的準備，可是沒有明白為甚麼應該改革。惶惑而所以依然有秩序，因為惶惑根本上是一種過度的容忍。對佔領軍連零星的反抗舉動也沒有，而只有共黨反對天皇的喊聲。只是日本已經使她身置自陷於變遷不定的狀態，這狀態給佔領當局纏絕大機會。不完成的日本目標。是根本改革日本。

投降一年半以後的今天，日本還是在變遷無常之中。原則還沒有明晰地確定。一千多個政黨中，在上次選舉時，只有較大的三十多個有資格選舉國會議員。主要政黨有六個：自由黨和進步黨是從前保守的民政黨和政友會的保守繼承者，在國會中為人數最多的集團。社會民主黨是第二大黨，在今日且為較前二者有聲望的政黨，其內部分為三派。合作民主黨和新黨還沒有確定的政策。末了，但是共產黨在國會的四百六十

六席中佔了六席。在這個大黨中，只共產黨保持表面上的團結，而事實上也是分裂的。共黨的領袖們是與潮流隔離的人，他們在一九二〇年代遭拘捕，脫獄以後，他們仍是社會革命者，而不是蘇聯的活動分子。他們拒絕蘇聯的控制，蘇聯要他們只反對天皇制度，而不反對天皇，就是採取和美英分別不大的立場。年輕的野坂在莫斯科和延安受過現代辯證術訓練，他領導下的親蘇派，正自信地靜待時機攫取權力。

新的名字到處都有出現。五十二萬鐵路工人的首領鈴木是這中間的代表。在戰時結束的時候，鈴木是一名鐵路轉轍手，和工會行政會議十五個委員中的其他十四人一樣，他從未加入過工會。當鐵路當局要解雇七萬五千名男女工人時，鈴木就以總罷工一天作威脅，出來與首相和交通大臣交涉，終於得勝。這事件解決之後，他又壓倒共黨繼續鼓動罷工。鈴木在英政府交涉時失去半個工會，而以後又給他贏回來，足以代表勞工運動的混亂。

現在日本人的表面生活很少安定，佔領當局的大問題當然是如何才能使日本安定。過去的心理使他們自己適於從事經濟侵略、政治侵略，以及最後走上侵略戰爭的路，是明顯的。只要對太上皇不加惡索的服從，繼續存在於日本生活方式之中，只要日常生活中有清醒和比清教徒更謹嚴的抑制存在，這抑制將引來罕見而劇烈的流血暴行。只要日本國內的安靜生活能夠激起向國外發展大商業、大政治和大帝國主義的野心——日本的問題就不會有解決的一天。單有日本人的熱情，不會解決問題。十九世紀明治天皇勅令西化時代，日本人對西化的熱情多麼大，可是日本只選擇了某些皮相的西洋技術，完全以順應日本的企圖為目的。在紀元前第七、第八世紀，日本曾以很大熱情着手中國化，從女人首飾到儒家的社會哲學以及中國文字，一切都模仿。可是這一切不過是一個不變社會的外衣。日本的意趣是盡量吸收，但是拒絕和她內心不變的信仰違反的技術觀念，特別是自由觀念。

佔領工作是傳教事業

但是今天有佔領軍在，這佔領牽涉到許許多多問題。要

從幾千哩外，把約十六萬軍和近四萬英軍運到日本，和從最近的補給基地解決這許多軍隊的衣食住行，要以電影院、啤酒廳、俱樂部、和參觀日本寺廟、公園、戲院，使這些軍隊保持相當好的精神，以醫生、診所、醫院和休息營，保持他們的健康。此外還包括一個訓練程序，訓練新來的步兵、拿兵、工兵、和兵工補給及情報部隊。美軍在日本的互作，許多都和在美國國內兵站的互作一樣。

可是這些並不是佔領互作的核心。佔領機構的有魔力的名字是 SCAP。這本是盟軍最高統帥部的縮寫，但是已經轉變為指東京城裏某三、四個辦公處的某一小部分美國人員。這些人員專監視佔領事務的進展和列表登記經過的情形。盟總實質上是一個傳教事業。這事業往往是動態的，可是很少是父兄式的。這事業幾乎永遠是傳佈福音。盟總決不下諭令式的文牒。盟總無意於對日本作盟國經濟入侵，亦無意於盟國長期管制日本。其主要目標實際是達到無需管制。盟總宣揚美國的好消息——同時也適當地宣揚英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的生活方式和宣揚代議政府及男女平等。

宣揚的互作現在做得最熱烈。因為日本已解除了軍隊和武裝，盟總正可以專心進行波茨坦委託互作的第二部分。消除日本人從戰爭的意向，而造福於日本。今日美國接近日本的情形有些像過去對於菲律賓一樣。日本人知道這種精神上的懷柔，可是盟總的人員表示不把他們自己的行動當作一回事，而只像是通常行事。這種態度已經大大有助於佔領互作，也許可以使這次佔領成為世界史上最不平凡的一件事。

盟總任用的人員並沒有聲名遠大的。文官的年薪最高不過一萬元，而武職人員除少數幾個將官外都沒有這麼高。在盟總互作，個人名譽方面的報酬並不大。日本隔得很遠，佔領的消息罕見登在美國報紙的第一版上。當然，少數人在等待許外人在日本經營私人企業的時候前去發財，還有些人是耽溺於東京方面所謂「單擊旅客」，但是佔領當局所吸引去的人，大都是極敏勤苦的人，他們的忠誠超過了野心。他們構成了美國才智的橫斷面。有共和黨員，有民主黨員，也有少數無黨無派的人。但是 SCAP 是一個團體，其和衷共濟必須使極少爭論。這團體發揮

的效力基於團體的信心一個偉大的使命待宣達，這信心文武官員都有，他們對佔領工作的態度大抵沒有分別。

麥克阿瑟將軍指揮這團體和他指揮太平洋戰爭一樣，他經常支持他的僚屬，他有一個權威的代表團，他賦予代表團相當的權責，因而他自己不致於經常為粗略的政策和細節而忙碌。顯得奇怪的是，麥克阿瑟在避免工作太多中，却完成了那麼多的工作。佔領方法的主要理論，出於麥克阿瑟，但是他沒有強迫盟總的其他人員唯命是聽。麥帥對待其他美國人有特殊的作風，他先依他們的見地加以深思，以激發他們的興趣，再依不同的觀念審慎思索，導他們到某種方向，這種方向，沒有了他，其餘美國人或許不敢冒險嘗試。

麥克阿瑟和日本交往的作風也一樣的偉大。麥克阿瑟不像他的前人培理提督那樣對東方人誇耀他避免炫耀。有一次憲兵司令欲為麥帥出行清掃街道就受到斥責。麥帥寓居的前大使館只有二個衛兵，某日當麥帥進他的辦公廳電梯時，第一次發現裡面已有一個日本人，這日本人雖然一再有自卑的表示，他却堅持這日本人其他一同乘登。這消息傳佈出去以後，一般日本犬感欽服，但是麥帥還是保持某種不可接近以維護他的威信。麥帥正式接見賓客和現身大眾之前的時間，只有從他的辦公廳大門走到那裏的卡地拉轎車那麼久。

在較重大的事情上，麥帥也表示出同樣健全的才能。他共其說下命令無寧說提建議，為了發展日本人思想上缺乏的民主精神，他主張不是盟總指示日本人行事，而要日本人自動行事。盟總的活動大概百分之九十是經美日之間非正式會議進行的。當日本人要求發佈正式命令時，盟總往往加以拒絕。如日本人提出像准許國會由復職權這種棘手問題時，他們得到的答覆是：你們為甚麼要問，當幣原政府陷入難局繼而崩台時，盟總的政府組 (Government Section) 宣佈本身與該政府無干，這樣就不會佔領當局欲維護或顛覆該政府的推測。麥帥就這樣力求避免踏入以諭令樹立民主的陷阱。

微妙的保守或進步問題，盟總盡力慎重將事，盟總不批評社會民主黨就是該黨的急進派亦不加批評。縱使五人們排斥許多工廠的經理而自行管理的時候，盟總也沒有確定的反勢互

行動表示。日本的保守和進步是以年齡為區分的，四十餘歲是區分點，盟總對老少都以同樣的善意相待。某些美國評論者非難盟總與吉田政府往還，因為吉田政府過於保守。這批評是根據盟總應按某種特殊的政治目的管制日本的。可是盟總的措施有更民主的前提，這可能日本應自行管制。

在另一方面，麥帥曾坦率說過，他反對共產主義，那就是以他威大的威信去反對。這意思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的演說裡正式宣布。當時他說，日本應該是遠東的民主堡壘，較不公開却更有力的。一次表示是五月二十日警告粗暴示威運動的聲明，這聲明儘夠使日本政府強化對共產黨的態度。共產黨不明但暗中和佔領當局不合，而且不久以後就要成為蘇聯的真實活動分子。不過共產黨的活動比較起來對盟總的改革方法和目的影響很小，可是他們可以使佔領的時間延長，因為只要蘇聯或受蘇聯控制的黨很可能侵入的時候，美國就很少可能退出日本。在這種情況之下，佔領期間就必須延長，雖然那時候佔領已不受歡迎。

然而，盟總並不是單單等待和監視。關於日本生活的一切，都有豐富的情報從政治觀念的趨向到消耗的電力都在分析。整個法制的剝解和連地方政府的研究在進行，還有旅行四島的直接實地觀察。被忽略的事，幾乎已經沒有。在魏羅培准將 (Charles A. Willoughby) 主持的情報處 (G-2) 之下，特別設一個民事情報科專門閱讀和分析日本國內的郵件——這工作無異經常供給盟總以公眾意見的投票結果——翻譯日本的新聞以及把所得的資料和情報處反諜報組 (Counterintelligence Branch) 得來的合併對照。此後盟總其他各處除原有職務外亦兼做諜探工作。在盟總之內還設有綜攬一切的一處，這一處往往兼編夜工作。經濟科學組屬下的各部門，研究和指揮反壟斷方案，財政情況，勞工事務，進出口事業，互業物價管制，科學，技術，統計和研究的進展。民眾宣傳教育組管理教育出版，無線電，宗教藝術和紀念物。對天然資源和公眾衛生及福利也設有專司機構。此外作為盟總和日本之間聯繫機構的政府組 (Government Section) 和其他各組保持接觸，從事對各地方政府，各黨，立法機關，內閣及司法機關的直接往來。為盟總

的一部分，而職務在佔領之外的，是國務院的各代表，他們在阿契生大使 (George Atherton Jr.) 之下成立一外交組。

盟總因為人員不敷，不得不正式通過日本政府而進行互作。現在的政府雖然是日本歷史上最進步的政府，但是還遠非理想的工具。日本政府執行佔領當局建議和指令，有時踴躍預料還迅速，而一般的講，總是滯緩。舊的思想習慣不易除去，對放鬆中央集權或取消儒家宗法制度的熱情，並不能保證以後的行動。因為除內閣和議會之外，日本政府隨時仍在官僚集團控制之中。個別處的官僚集團一樣，他們企圖阻礙改革。況且日本人還不明白何謂改革。許多人以為所謂改革，其從吉田的保守黨（和佔領以前的政治有別，而稱自由黨派）轉到社會民主黨的急進派（而不是共產黨）無大差別。日本人的生活曾經是那麼高度的被動，他們很難不因呼吸到較自由的空氣，而感到害怕或昏醉。這種大半下意識性的害怕，使官僚們存觀望態度。在這種觀望態度上，由較老而守舊的人員組成的吉田政府並沒有使官僚們過分受挫折。而且現政府還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才成立的政府，現在還不知道能夠支持多久。由於糧食的缺乏，社會民主黨已增加黨員。現政府很可能在預定今春舉行的選舉之前倒下去。不過現政府自由選舉產度，確可以代表其人民。這政府也代表保守派的主體。盟總在與日本政府裡有時表示猶豫的人員交接中，亦不接到日本人民內心的猶豫心理。

防止戰爭和壟斷

新日本憲法的產生，以及盟總和日本政府之間的商談，其取決於麥帥最初向投降後第一個政府的表示。盟總有前提議憲法的籌備工作，即行開始。結果幾乎沒有反對。盟總只有徒然等待。到幣原政府（成立）麥帥立即與新首相商談憲法問題。政府先開始討論，不久各政黨也開始談憲法問題。討論憲法的事日盛一日。直至報紙上登載長篇的辯論，個人或團體都開始自動向政府提出計劃。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府把這些資料集成一束，作為一部分的憲草案。當時表現出的最大缺點是對徹底取消極權統治的猶豫。

麥帥第二次和幣原商談時，就把盟總引出來，提出由

輝脫尼准將 (Countrey Wickham) 領導的政府組協助研究並提供建議。幣原接受以後，適東京就有一連串的談判。政府組就着手廣泛研究當代世界上所有的憲法，提示日本政府，有時還把日本人推向——但未發布指令——自由和分權制的方向。這種自由和分權制，若日本人的祖先見到，當大吃一驚。幣原首相亦參加的談判中，對完成由日本人自己編撰的憲草修正憲草和完全的新憲草，都曾經從可能的角度加以討論。有些條文的產生很容易，如幣原和麥帥一次談話之後，就把防止戰爭的一條幾乎定為最後的形式。有些條文的產生很不容易，如國會上議院的選舉法，化幾個月的討論才決定。

最後日本人士終於完成準備工作，帶着相當的疑懼把憲草送至玉天皇。雖然日本人不但剝奪了天皇的君權，而且剝奪了他大半的財產，可是在這個傀儡的面前，他們仍感到某種程度的慌張。然而，天皇加以嘉許，他和麥帥（麥帥稱天皇為日本政府中最自由的人）會談，並且領導政府創造憲法的政府宣揚憲法的優點。

專為辯論從未有的憲法而設的春季選舉之後，整整有二個月，在議會中推許作自由或激烈的辯論，而全部辯論都廣事停布。結果有三十三條經過修正，有三條被刪去，另外還加上一條。在這段時期中，凡是想試探盟總意見的人，盟總總是盡量設法避免有任何意見。所以有一度時期，輝脫尼將軍專門以告訴日本人可以對他們的憲法任所欲為為務。

十月七日下午議院以只有反對通過憲法。這憲法規定的政府，或許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這憲法保證的自由，和任何其他憲法一樣多——甚至禁止竊聽電信，限制法院中對口供的使用，准許任何人訴願而無罪。這憲法規定十足代表性的上議院。官署禁止任何人出入，但不禁止平民（對這種人一個新的日本字必須發明。）這憲法完全廢棄戰爭、軍備和軍隊，並且剝奪天皇的權力。

這憲法是一種熱情的產物，且不说開始和迅速根絕日本的海陸軍破壞的互作，已經有些更趨複雜，而對日本人或許已有些減少激勵性。舉例說吧，解散財閥這件事，菲華會議和建議就不够，還需要協商訓令，甚至於美國調查團總之一切需要時間和

忍耐。日本壟斷情形的複雜，僅次於廢除壟斷的需要。所謂壟斷，主要是五業。半封建的帝國主義，也造成軍備以一種體系作帝國主義的支持，那體系是國內廉價生產，國外則以相當高價銷售，其剩餘用於擴展機械設備，發展重工業，最後則從事於戰時生產。

在形形色色的把持之下，聯合公司 (Conbunda) 在日本是無匹的。一個家族透過東方家族會議，高級壟斷公司，直接所有公司及用證券和董事會團結的附屬公司，這一套體制就可以控制貿易、煤礦、銀行業、造船業、紡織業和其他事業的龐大而廣泛的利益。三井貿易公司是高級壟斷公司之一，它就單以這種方法控制一百五十三個附屬公司。此外像其他財閥一樣，由於買賣專利和信用契據的關係，還有無數其他公司依附於三井公司貿易公司。在日本，沒有巨族的准許，很少事業可做。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盟總第一次用凍結十五個最大壟斷公司證券的訓令，攻擊這大組織。到第二年，這凍結的範圍逐漸增加到一千二百個公司和它們的附屬公司。但是財閥們對於自身利益的念頭轉得很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他們帶了一個取消自身地位和他們高級壟斷公司證券的計劃前來盟總。這計劃後來轉送到清算委員會，盟總接受這計劃，保留巨族行動的完全自由，繼續凍結巨族的私人資財，並且命令日本政府展開合理的分解和反壟斷計劃。

到四月裡，日本政府答以擬組織一壟斷公司清算委員會 (Holding Company Liquidation Commission)，但在七月中盟總不得不發布訓令，以擴大政府的計劃，和繼續控制巨族的行動自由。到九月，清算委員會按轉移和凍結資產的計畫開始工作。這計劃現在正以優先購買權及國家銀行貸款之援助，給予個別的五勞五協會，少量證券持有人及人民大眾。十月八日，五大財閥正式交出他們的證券，財閥們得到票據作為交換。這些公債券在證券出售以後，可以換成十年為期的不流通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和其他的財產都要納特殊的資本稅。這樣財閥們大半將只能保持他們以前財勢的小部分。一九四四年（即物價極漲之前），三井資產的估值為六億日圓，在轉變為公債券中，這數值就可以縮小到四億日圓，而賦稅還佔去大部分——總數的百分之九十。結果三井將

只剩四千萬日元，這數值依現在的購買力比率算，比一百萬日圓還少得相當多。

十一

巨族是因此而殘廢了，可是聯合公司却還沒有破壞。盟總日本政府各公司本身現在正研究如何把整個的組織拆散。這幾乎就等於再建整個日本的經濟。單使三井貿易公司和所有的附屬公司分開是不够的，必須使三井貿易公司共三井礦業公司，三井化學公司和其他同類公司之間，斷絕股票、董事、專利業務或信用往來的一切關係。還有，聯合公司一經拆散之後，必須防止它們再聯在一起。所以盟總曾經下令取消一切扶助壟斷的法律。培養反托拉斯法，除了改革商法，亦改革銀行法和專利法。聯合公司將再因賠償而削弱，那是說，在賠償中要搬掉一部分機器和設備（這中間聯合公司可以獲得一些現款的補償）。但是改革的互作是漫長的，而且只有盟總將反托拉斯的熱情移轉到日本人民自身上去，這改革才能成功。

佔領的變則

佔領仍舊是軍事性的佔領，正因為如此，佔領不可避免地陷於遠離軍事機關在發布命令之外，盟總欲日本自動行事的民主意願隨時要碰到日本人的無能或不願行事。在那種情形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頒發指令。在佔領的最初十二個月，已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件。這些指令，日本人是那麼容易迎合，他們就當做法令。——這情形固一個事實而更複雜，那就是在許多場合下，日本人不能說出盟總是否要撤消。在許多方面盟總的管制極其度鬆弛——不但政治方面，經濟方面亦如此。例如像玻璃和紙這類物品的生產和分配，但是像很需要又很缺乏的肥料，除生產機器外，盟總幾乎無所不管。盟總對奇缺的煤，現在仍繼續嚴緊管制。盟總對日本工業的一般管制，頗較美國戰時工業管制為甚。準備以熱誠扶植自由企業的日本，發現自由的氣氛裡，雜有管制的麻醉藥時，並不表示驚奇，有時亦沒有激怒的表示。這驚奇不但新興的實業家感到，許多政治自由分子，甚至有些社會主義者也感到。這些社會主義者，在今日日本思想的變遷無常狀態下，目自由企業為再建日本社會的根本而建設性的方法。

主要的目的，當然是恢復並保持日本為一個工業國——否則日本一半人民將餓死。所以日本社會需要大加破壞的事實後面，緊跟着需要大加建設的事實。例如，壟斷事業的破壞得越多，日本的經濟就越紊亂，失業就愈增加，國內貿易達到適合日本人民需要的数量和平衡的日期也就愈遲。假使這日期能突然神妙地到來，佔領的互作就可以順利地進行。但是正當日本經濟嚴重地混亂的時候，盟總必須面臨整肅政治、宗教、教育和民主分權等問題。

物價已比一九三七年漲了約三十八倍。工業資本只有百分之三十在生產，而整個工業還在戰爭結束時儲存的原料上工作。失業的人數有五百萬，而且若不是日本政府以保護者的地位盡量設法容納，還有幾百萬人要失業。由海外運送回國的沮喪軍民有四百五十萬，糧食不足，食鹽進口數量不大，煤也只有戰前的一半。世界上別的地方缺乏的一切日本都缺乏。連紡織機器的零件也缺乏。由於 100% 的轟炸城市，信任的缺乏更為去銳。死傷連夜地從東京的上野車站搬出去成千的人擠進去安息。日本人在受凍病、吃不飽、住得陋的苦。

大多數大的配製廠都已關閉，這使大大小小一整批的配件廠都停了工。戰時生產機器和武器的工廠都無工可做，只得製造許多銀座露天貨攤上的廉價零星商品——如玩具、剪刀、小器皿和廉價攝影機。有些飛機廠已經開始製造三輪自動車，但是許多這類的機器將用作賠償而不復存在。日本的經濟仍不外是殘存的經濟。這經濟正在不利於復蘇的空氣中掙扎以求復蘇。例如日本船舶還留有一百萬噸，這噸位足夠應目前之急需，但是任何大小的對外貿易還需要再加二百萬噸，可是當盟國未決定削減日本國際貿易的標準以前，誰將開始造船？

建設日本經濟就要造成日本心理上遵奉上級命令的偏見。過去的日本經濟就從這種偏見中生長起來。在佔領以前，事業並不是由許多人管理，而是由實業家、軍閥和官僚組成的一個小集團管理。這小集團的行動是那麼集中，結果很難辨出實業止於何處和戰爭與政府從那裡開始。有一度時期，這集團的一部分或許佔了優勢，但是其他的每一部分都保有

影響力。這集團傳出了聯合的方針，讓日本社會的其他部分去適應。但是在這方針中，除了原則以外，往往很少固定性，所以從法律到實際事業間的一切，可以隨掌權者的命令而轉變。

盟總也許不歡喜這生活方式，但是無法突然拋棄管制機構。財閥指揮戰時生產的方法，要在一年餘的時間內廢棄掉，是不可能的，因為管制工業的某些執行方法必須保留。所以這些機構只是名義上取消，只是民主化到以前由政府委派的官員改為選舉的程度，而在處理次序和部署方面還留有許多和以前一樣的地方（下級人雖可較以前多說話，但仍很少有人說出來）甚至還需要保持著名的戰時的鄰組組織（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這種組織雖然包含有警察和政府宣傳，可是取消這些組織，將無異於取消唯一已設立的定量配給制度。

所必需的，不但是保持舊式的熱心控制，甚且還得更大大更有效的。控制方式，為適應日本統治集團沒有固定觀念而設計的舊經濟處理方式，是煩瑣的，例如物價管制就分散於向各個省負責的許多機關，因此盟總促使成立一專責機關——經濟穩定局。這機關把更多的合法權力集中於一個人手上，這樣大的權力，除了東條可能是例外，日本人從未賦予任何人。這機關的省長的使命並不容易，他的權力理論多於實際，因此盟總常常給予非正式的支持和鞭策。雖然事實上沒有一個管制制度可以滿足日本人民和工業復蘇的需要，可是他面臨的問題沒有鬆弛。所以盟總和政府必須注意以高價吸引農村食糧的大多數。黑市市場，這些食糧假使只付以法定的價格，就將留作農村自行食用。

物價管制不過是許多問題之一。日本的資本組織雖然適合於財閥是非常不健全的，沒有確立的公開會計師制度——這就是當股券持有人實際管理他們的公同時，為甚麼股券持有人一定要準確的報告，亦就是甚至於當銀行和他們自己的分行來往時，為甚麼要謹慎於款項。對政府和實業界，盟總必須宣傳效率和責任心，同時盟總必須設法改革銀行內部的互作方式。

可是這改革，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產生了混亂。例如最近擴大整肅戰時領袖，立即顯出有益，但是棘手。不像戰犯審判，整

肅不是懲罰，他們企圖產生一個合乎需要的新領袖集團，可是他們拉攏的人不但包括曾經過分熱心於戰爭或過分苛虐的人，且亦包括戰時倖居要位的人，他們向政府、工業、銀行、政黨、工會、文化協會、無線電、電影和報紙這些範圍擴展，剷除舊的領導是聰明的，或許是必須的，但是剷除舊的領導，不可避免地使日本失去在管理方面的經驗，而日本在目前，却最需要這些經驗，所以剷除舊的領導，使重建日本的互作趨於錯亂，同時在佔領機構的官員中間也產生了意見紛歧。

民主化互作

盟總深切明白建設破壞的矛盾表象，可是它不得不在這種矛盾表象下執行任務。對於大多數的日本人，這矛盾的表象可以歸結為一個字——民主化。缺乏民主經驗的日本人以為民主化的意思，就是佔領期間所已經發生的一切，日本人容易想到，民主化指其任命相反的選舉，但是他們也有一個模糊的觀念，民主化是比這還複雜的一回事。事實上盟總曾以許多很具體的民主實例，向日本人說明。

現在民主對於日本的意思是對抗政府的各種自由和法律上的各種解放，這一切他們以前從未享受過。在法庭上，使家長不比最幼子的妻子重要，是民主所意指的，有些令人不安的平等，民主包括杜絕統治者狂想的法律，嚴正也含蓄防止警察淫虐和其他類似事情的審判公正。民主是欲把政權分散，以打破過去固結縣市於東京政府的鏈條。民主甚且意指提出整肅官吏和教師的，不是東京政府而是日本人民。

民主是使天皇含有新鮮而有幾分混亂的觀念，天皇變做減少不可接近性的神，而更像賦有人性的天父——這轉變日本人正抱着不少的疑懼在進行。現在天皇被看作不過是看得見聽得到的某種東西，裕仁完全不動人心目，他的聲音不好，許多飢饉的日本人並不因他對糧食情形的廣播而感到滿足，因為他宣佈的解決辦法是善良同胞之愛。裕仁站在瀨而水浪飄過他的皮鞋的一段電影，徒然引起浪濤稀少的皮革的談論。在春耕節中，天皇任稻米的特種保護人一個農婦，見到他猶疑於應走向那塊田地時，以深切的醒悟說，他認不得稻。許多人對天皇有一種親切感。

這感覺出於對不得已而失面子求和的人之同情。對於結束戰爭，幾乎所有日本人都深切而由衷地感激他。大多數日本人承認批評天皇不再是不應該了，當各報紙描寫天皇除呵，是外幾無所事事時，並不犯罪。可是當一個兵以一張標語在皇宮前誇示時，標語上說天皇不關懷人民的缺乏糧食，他立即就以誹謗罪（不敬已不再是犯罪）被捕，經審判下獄。他的釋放不是根據法律，而是由於天皇的勅令，就是憲法公布日的大赦令。日本人對天皇的觀念還沒有精密地確定——他像是失去神性的某種天帝——但是日本君主張至少要把天皇作為國家的表象去尊敬和服從。這一點在日本人似乎也屬於民主。

民主包括一種新的教育。民主意味着像歷史和政府學這類課目需要一套新的教科書，用大不同的體裁，由完全共前文部省無關的日本人編著，因為過去的文部省主要地是一部灌注宣傳的機械。民主表示不需要神道倫理的教科書，而以公民學的手冊代替。民主表示教師和下級官員可以看見盟總的指令，盟總的確主張他們該閱讀這些指令。

再者民主化是要取消地主分散土地，這些土地過去佃農和半佃農（佔農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九）要付收穫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作租金。這是一種束縛佃農的制度，地主把佃農一天緊一天地鎖鏈於這制度之下。十月十日的改革令，地主的出租地只許稍多於二畝自耕地，只許約七畝，並且強迫他們經政府之手以低價出賣多餘的土地。這命令還建立新的信用借款條例和可以持久的租佃規章。

民主化最不平常的一點，是很混亂而非常活躍的勞工運動。這勞工運動熱心地以美國的職工聯合主義為根基，却很不準確。在佔領的最初十二個月裏，有四百萬勞工加入了這個運動。這人數約佔非農民勞工總數的一半（總數一千三百萬，減去城市失業工人四百萬）。勞工對這一個崛起的反應有如一個人體溫急速升高時的不省人事。接着有二個集團出現，一個是日本勞工聯盟（The Japanese Federation of Labor）（這個團體日本人自己也以它的英文縮寫J.F.L.稱呼）另一個是工業協會國民公會（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Industrial Unions）（通常用C.I.U.代表。在J.F.L.比C.I.U.保守方面，這二個組織反映出的意

見不同的程度和他們在美國的對應派之間一樣。C.I.O.的主要政治思想大部分集戰前五會的殘餘，是社會民主派的，它的許多工會禁止共產黨參加在另一方面新組織的C.I.O.大部分却由共產黨組成。共產黨是小集團，可是一時之間還是組織上最具經驗的集團。在職工聯合主義的方式上，C.I.O.和C.F.W.幾乎是一樣的。日本幾乎已完全跳過同行組合主義，例如四百萬交通方面的工人，只有十個單一的工會。

在上述二個組織裡，共產黨的勢力似乎都在相當地衰退。C.I.O.正學習如何識別共產黨（一旦認定為共產黨員，立即予以開革。C.F.W.裏却有居高位的共產黨員，特別是各地方辦公室裏，貿易協會就是這種狀態，沒有人能夠加以控制。C.F.W.的各個工會，行動上自治，思想上亦獨立。不但有些工會反對把貿易協會混進政治裡，而且還有反對共產黨及天皇主張的激烈反動。

四百萬工會會員之中，只有一百萬人受集體交易協議（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的拘束。每次罷工，尤其是有共產黨員參加的時候，往往陷於混亂和怪異。電氣工人曾經二度實行五分鐘停電，鐵路工人則一致鳴汽笛一分鐘，一個戲班全以手勢演一齣戲而無口白。也曾經過過絕食罷工，閉生罷工，生產控制罷工和別的方式。共產黨過去在罷工中的主要威脅，其說將進而控制勞工運動，不如說企圖以政治手腕破壞勞工運動。這種破壞行動將引來不幸。不管勞工運動如何紊亂，今日在整個日本，它還是民主發端最顯著的例證之一（勞工運動或許不能準確地代表民主，但是它代表了民主的大部分）。

倘使民主化包括上面的一切，民主化對日本人，是同他們的過去一刀兩段。這斷痕是那廣大日本常常表現出，好像她被推向中心然後又立刻向另外一個完全新的生活方式前進。

佔領的表面

大問題是日本人所受的推動有多大。換句話說這打擊能不能穿過表層深入日本人的心靈和情感。自然佔領效果最明顯的必然是東京，因為東京是大部分佔領機構的集中地，而且像投石於湖掀起的波浪，佔領的影響應該隨距離增加而遞減。有幾個離

東京不遠的市鎮，還從來沒有美國人蒞臨過。即使在東京，日本人內心的底層，必然也很少改變。例如日本的家庭生活，就很少有甚麼改變。

語言的形式足以表示一個民族深刻而幾乎無意識的信仰，而日本的語言不曾改變，和任何人意見不同仍舊認為是無禮貌——尤其是和盟總意見不同，不褻瀆神聖的發誓，依舊不可思議的存在。談到不同階層的優等和劣等人，仍舊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語式，甚至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字眼。一向被認為下等人的婦女，說話的語式仍舊和男人所用的不同。日本人十分願意簡化他們的文字，而且有許多熱心於採用羅馬字母，但是到現在沒有一個日本人採取或甚至於建議——日本人自己可以建議——語言上任何重要的改變。

藝術和建築方式也同樣地反映出生活方式的基本要旨，而日本的藝術和建築，仍致力於嚴正而足以牢籠思想和情感的簡樸和抑制。義務和服從——用一個詞表示就是紀律——仍是日本人處事的根深蒂固的觀念。

在宗教方面習慣方面也很少改變。天皇仍向他的祖先祭告重要的消息，新憲法以詔教正式在議會中公布，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已以祭告死者的方式先行公布。神道教的核心倘不是崇拜天皇，至少是國家崇拜。該教已經除去超國家主義的教理，而與政府分離，因此不能收受納稅者的金錢。天皇亦只以私人資格參加該教，但是神道仍以大不止於金錢單純是民眾的自然崇拜而存在。大率由於時間和交通困難的關係，神龕的供奉就不十分注重，神們因此稍失面子。這些神假定中是保護日本的，可是現在大眾都普遍同意，首先他們與戰爭就毫無關係，不過是負責戰爭的人誤用了他們的名義。佛教不曾有過發覺新力量的模樣，基督教徒仍是稀少。同時供奉日本戰死者靈魂的清國神社依然存在，日本人對這些神，比普通的神還尊重。日本人對違犯神依舊是那麼可怕，因好戰而死，使死者有特殊地位，並且需要生者給與特殊的安慰。神道教已經被用分散神社管理和脫離同政府之間的關係，民主化，學校裡也根除神道，可是神道的情感基礎沒有改變。

新儒家的家族和國民天職的觀念也沒有改變。日本人的生活

上的大衝突，也是久已成為日本悲劇基礎的衝突，存在於個人自身的志願（不是他的善惡觀念，亦不是他的真理概念，應注意的）是他的志願）和社會的責任之間。在這個衝突中，社會的責任總是有效地得勝。弟弟順從哥哥，女人順從男人，兒子順從父親，同樣的，低的順從高的，所以全都順從天皇——最後都順從盟總。自由是依附於人的一個條件，但是日本人還只是模糊地以人而存在。日本人無寧是以團體形態而存在，因為即使在處理政治經濟的問題時，盟總極難找到負責的個人。所以我得到的，是人的集團，這集團以錯綜複雜地對長者和有地位者的盡忠而結成，連整肅和反財閥的措置，也無從拆散他們。改革的最大阻碍，在於最堅信儒家的許多集團。

在這種情勢之下，可能的危險，是極權政府和侵略戰爭導生的危險。過去對軍備過剩的癖好，現在雖然掩蓋着，是並沒有根除的。在日本，左派和右派一樣容易實行極權主義。共產黨太上皇，可以和其他太上皇一樣地適合於日本人心理上的偏愛，而一旦日本共產黨完全受蘇聯的控制時，且日本共產黨無疑將叛化反天皇運動（現在該黨正因這個運動而不得民心）而且將無疑地減少和日本傳統之間的距離。共產主義在日本的危險，由於日本人民仍抱有封建式的思想習慣。

盟總對這個局勢，曾經聰明地作了一個結帳的嘗試，就是伴為假定團體服從可以存在，却鼓勵個人的進取性。這樣當前的表面改革，日後可能吃根盟總或許可以用設立發布命令的範圍和條件，除去個人進去性的某些障礙。盟總可以放寬新聞檢查，使盟總本身就變做日本人公開討論的題目，來鼓勵自由討論。現在盟總是不准批評的，此外我們或許可以舉出盟總的一個失敗和一個不幸。所謂一個不幸，是美國佔領軍隊中經驗年齡的參差。每一個兵都是文化交接的一條路。這交接的私有的價值，正因為這交接，我無識意識，單單有二十萬美國人和英國人在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影響日本心理的深遠之處，而且他們的影響暫時還顯得好而偉大的。初到日本的兵是年長而久經戰場的，他們和日本人之間的往來是和藹而成熟的，以後去的兵，是年青而沒有經驗的了。他們所給與日本人的，徒然是對美國人行為不端的厭惡和糾纏的黑暗交易。但是這不幸幾乎無法補救，除非美國人民準備負擔一

筆費用，把繳得的士兵，在送出國之前給與適當的訓練和教導。在另一方面，所謂失敗倒是比較容易補救的。當日本人準備知識一切的時候，拘泥於版權慣例的阻礙，沒有把西方傳統的文學哲學的更重要著作介紹給日本人。倘使要使改革日本生根，必須施以智慧的肥料，這施肥工作，可以由像為國外美軍選擇普通讀物的民營機構負責，這機構不專以營利為目的。

這一步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已不再能確定地說，日本人的心理不會有根本的變更，而只能說將保持靜態。日本正在變遷無常的狀態之中，現在需要努力的，是使封建儀式和心理習慣和西方的機械生產、普選廣播、電影甚至於酒店、小跳舞同時並存。在明治天皇維新的時代曾有意的作這種努力。天皇的地位、神道教的觀念，甚至於舊憲法的細目，都曾經過審慎的功夫，以保存日本人的思想上的島國性，現在沒有作這種努力，而日本人的生活，正逐漸地却更猛烈地受到外來的襲擊。

還有一點，日本現在還沒有新的太上皇集團出現。當然，過去日本是經過混亂的時期的，在那種期間，誰也不知道誰是太上皇，可是也沒有懷疑太上皇制的原則。可能盟總是一種過渡時期外來的統治階級（參帥是這過渡時期的外來神），虛授斗做選舉的貴族政治，民主可能產生一班領袖，日本人民將使他們自己像過去一樣牢固地受這班領袖的束縛。可是現在的事實是繼續出現於今天日本舞台的許多人是激發出來的人，他們決不同於日本的舊統治階級。

有些激發是出於自私的，財閥經濟貴族的打倒已經產生對私財的一種醉心，這私財的規模之大將為日本前所未有。而這種事業上的個人主義很可能轉移到日本生活的其他方面。徒然培養另一些富家家族，誠屬可能。但是這可能性遭遇到勞工互會的興趣，工人對改善環境增高工資的要求，既不含含神道教亦沒有儒教進一步講提高工資，必將大大地改造日本的經濟。提高工資後的日本，重工業擴展和財閥就不容易維持。這些事實在最近雖沒有多大意義——日本直接的經濟變事，實是，日本將有長時期的經濟虛脫，而直接的經濟需要是日本必須設法復興。可是在將來，這些事實可以有很大的意義。

可能的情形是：日本將更有效地利用西方的事物，不變的古式心理將使日本自身投入右派或左派的極權政治。但是佔領當局的表面大改革將激起更深的反應，從厚木機場開始的偉大社會試驗將引向更相對的思想方式的混合，也是一樣的可能。日本在許多方面可能仍然保持原態，可是舊式的義務與抑制將打破日本的思想因而有了自由。

二十

——完——